

(K-1095.0101)



ISBN 7-03-018318-5



9 787030 183187 >

ISBN 7-03-018318-5

定 价：108.00元

4 ~ 6 世纪的北中国与 欧亚大陆

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

张庆捷 李书吉 李 钢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山西省社会科学 2005 年重点课题,是关于北朝与欧亚大陆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联系以及相互影响的论文集合。全书共收入八个国家学者的论文 23 篇,均以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为基础,对当时北朝的统治中心区域及其周边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商贸往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论题涉及器物、服饰、文学、艺术、宗教等研究。

本书可供从事北朝文物考古、中西文化交流以及相关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4~6 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3-018318-5

I. 4… II. ①张…②李…③李…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外国—4 世纪~6 世纪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0574 号

责任编辑:孙 莉 李木兰 / 责任校对:纪振红

责任印制:安春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4

印数:1—1 700

字数:560 000

定价: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序

巫 鸿

(美国芝加哥大学)

读了这本文集的定稿，再一次感到北朝研究这一领域对近年来中国历史、考古、文化、宗教和美术等诸学科发展的关键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研究资料的迅速扩展和对以往历史知识的补充。本集中不少文章都是对考古新材料的研究和阐释。这些材料，如一起起新发现的粟特人在华墓葬和精美葬具，往往是以前不知道或所知有限的。每一座墓葬都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料库”，不但含有建筑、画像、雕塑和器物，而且包括极其珍贵的墓志。与传世的单独的艺术品和文献不同，这种考古“资料库”中的材料属于活生生的文化“原境”，它们不但填补了专门学科中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启发，引导我们去考虑更深刻的有关文化交流和互动的问题。

这就引申到北朝研究的第二方面的意义，即对文化和历史发展在广义上的反思。这本文集的题目是《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因此隐含了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与互动，以及外来文化在新的环境中的发展和变异。这些都是当前历史、考古和美术史研究中的热门问题，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不仅被新的考古发现促进，并且由于当今世界的迅速“全球化”而与现实具有了某种联系。实际上，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已经把分析的眼光从当代逐渐扩展到现代、中世纪，甚至古代。虽然不同学者对“全球化”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但基本上都同意跨文化和跨国界的往来不但在现代史上，而且在古代史上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这种往来的性质、范围和机制。通过研究这些问题，研究者可以扩大历史观察和研究的范围，从“国家史”或“民族史”的史学模式转移到以跨文化和跨国界为基础的对历史联系的重构。

根据这种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对全球史的一个宏观分期，把18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阶段划为跨国联系的滥觞期，与其后的四个时期（包括1750~1880年的欧洲工业化和帝国扩张，1880~1945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和政治危机，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冷战对抗时期，以及最近30年来的网络时代）共同组成一部全球化的历史。这种分期明显是从现代和当代的立场出发，而且有较强的欧洲中心的倾向，但它的长处是打破了国家的界限，促使我们考虑每个时期跨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特性。

我想，如果我们把北朝研究放在这个广阔的学术语境中去考虑，就更可以感到它对一般性史学思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汉、唐帝国通过疆土的扩张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和艺术交流，南北朝时期的“混乱”则提供了另一种促进文化互动的机制。这种机制大略包括三个相互重叠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宗教的跨国传布：在这个时期里佛教从南亚传布到东南亚、中亚和东亚的很多地区和国家。其他一些宗教也以此为模式，其流传超越了政治疆界甚至文化认同的限制。第二个方面是长途贸易：以丝绸之路为主的贸易干线沟通了从东亚到欧洲的大大小小的地区，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思想和文化艺术的交流。第三个方面是人口的迁徙：不但是整个国族的地理移动，而且大都市中移民数量的急剧增长造成了不同文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复杂局面。这本论文集集中的很多文章是和北朝历史的这三个方面有关，其所讨论的“外来文明与艺术”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内跨国文化互动的内容和表现。

南北朝和隋唐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由此进行反思。我不太同意一些西方学者把汉、唐帝国的领土扩张当作亚洲古代史中跨国交流的主要形式，而倾向于认为北朝时期的三种发展对这种交流起到了更本质的作用。并且这三种发展不因国家的统一而停止，而是常常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得到更迅速的发展，结果是推动了统一帝国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汉、唐的“一统”是战国和南北朝时期激烈变动的结果，而这些变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的跨国文化互动的方式和机制的出现和形成。

2005 年 7 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巫 鸿 (i)
北朝的发展轨迹	李 凭 (1)
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	张庆捷 (12)
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	安家瑶 刘俊喜 (37)
步摇考	田立坤 (47)
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输入的西方器物	王银田 (68)
北魏平城期的鲜卑服	宋 馨 (84)
巴黎吉美博物馆展围屏石榻上刻绘的宴饮和宗教题材	
... 德凯琳 (Catherine Delacour) 黎北岚 (Pénélope Riboud) (施纯琳 译) (108)	
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	荣新江 (126)
鱼国渊源臆说	余太山 (140)
北朝的镇墓兽——胡汉文化融合的一个侧面	小林仁 (朱岩石 译) (148)
对北朝粟特石屏所见的一种神异飞兽的解读	
..... 康马泰 (Matteo Compareti) (毛 民 译) (166)	
北朝粟特本土纳骨瓮上的袄教主题 ... 葛勒耐 (Frantz Grenet) (毛 民 译) (190)	
史君石堂上所见呾哒人形象初探	毛 民 (199)
佛教在北朝的弘传及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李书吉 (215)
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	李裕群 (233)
云冈昙曜五窟中的外来因素	张明远 (247)
从考古发现看北朝中外绘画交流	渠传福 (263)
高句丽墓室壁画的佛教因素——与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	
..... 李正晓 (Lee, Jung Hyo) 崔德卿 (Choi, Duk Kyung) (280)	
长崎县壹岐双六古坟出土白釉绿彩圆纹碗	弓场纪知 (王虎应 译) (310)
论南北朝华北陶瓷的革新	森达也 (324)
就山西北朝、隋唐文物看异域文化的传入	杨巨平 (335)
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漆画题记研究	殷 宪 (346)
由庾信等人的作品看北朝佛教与文学之关系	牛贵琥 (361)
后 记	(377)

北朝的发展轨迹

李 凭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朝的奠基者是鲜卑族拓跋部。鲜卑族拓跋部原本是在大鲜卑山的嘎仙洞^①附近从事射猎的部落，在陆续兼并了大量游牧部落以后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兴盛于北方草原。拓跋部落联盟以位于河套的盛乐^②为据点，乘淝水之战以后前秦王朝崩溃之际而迅速向东南发展，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398年立都于平城^③。经过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代的东征西伐，北魏于439年统一北方，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的十六国割据局面。北魏王朝统一北方，是北朝开始的标志。

北魏王朝先后建都于平城和洛阳两个城市，因此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平城时代与洛阳时代。平城时代自398年起至494年止，为时接近一个世纪。洛阳时代自494年起至534年止，为时仅仅四十年。

宣武帝朝以后北魏政局日益衰乱，各地暴动相继不断，六镇、关陇地区先后起事，随后出现席卷河北、山东的大动乱。528年河阴之变以后，北魏王朝名存实亡，先由尔朱氏家族擅权，接着是高欢家族专政，最后被权臣高欢与宇文泰分裂成二，史称东、西二魏。

东魏以邺城^④为都城，550年被高氏夺权，建立北齐王朝。西魏建都长安，557年被宇文氏取代，建立北周王朝。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篡权称帝，改国号为隋。589年隋朝大军攻灭南方的陈朝，中国统一，北朝结束。

一、中华文明的播迁

由于北魏王朝的崛起结束了中国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因此要准确地把握北朝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将它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特别是置于

① 嘎仙洞，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

② 盛乐，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

③ 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

④ 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

东汉以后的社会形势下，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加以阐述。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动荡。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乱，其中对社会经济破坏最剧烈的有三次：第一次是 189 年开始历时约四年的董卓之乱以及由此引起的广阔范围的军阀混战，结果中原出现了“铠甲生肌虱，万姓以死亡”^⑤ 的凄凉景象，致使东汉政权的统治被摧毁；后两次是 291 年开始历时约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和 307 年开始历时约六年的永嘉之乱，这两次战乱紧密衔接，人民几无喘息之机，因而破坏尤其剧烈，于是西晋政权的统治被推翻。三次大的战乱就像间歇性的强烈地震一样，摧决了自秦帝国以来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

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出现的动荡不安的政局，引起频繁的民族迁徙和大量的人口流动，就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刷洗了作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的中州大地。昔日的良田美畴被无情的铁蹄践踏，汉晋以来营建的长安、洛阳两大繁荣都城被夷为废墟，废墟之上走马灯似地出现了众多割据政权，形成所谓十六国的分裂局面。

以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汉族文化覆盖区，是经过先秦和秦汉两大漫长时期形成的昌盛地区，这个地区的文明程度超过了其他的地区，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汉族文化的昌盛地区被严重破坏以后，政治中心便向洛阳以东转移。于是，先后在北方称雄的袁绍和曹操就都将他们建立霸业的根据地置于黄河下游的河北地区。西晋灭亡以后，河北地区先后处于羯族和鲜卑族慕容部的统治下，大量的汉族人民被留居于此，内迁的胡人也逐渐增多。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一地区的经济复苏了，从而形成以邺城、中山^⑥为轴心的汉族与胡族融合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区。所以，天兴元年北魏的第一代皇帝道武帝率领拓跋部进入中原，随即就被邺城的壮观景象所吸引而流连忘返。据记载，道武帝“巡登台榭，遍览宫室，将有定都之意”^⑦，只是迫于后方叛乱的形势，他才不得不退回平城。

在当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汉族文化最高层次上的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不再由国家控制下的学校所垄断。自从学校制度随着汉王朝的覆灭而被一度废弃之后，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就不再由太学博士教授，而是改变为父子世代相传。因此，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就主要掌握在若干大家族手中，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家学。在河北地区，残存下来的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主要被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族所承袭，北魏平城时代最活跃的政治家崔浩、高允等人便是这样的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向拓跋统治者介绍过汉族文化的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为蓝本，为北魏王朝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这些典章制度后来一直传续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时期，为他们全面地推行改革政策奠定了基础。

⑤（东汉）曹操：《蒿里行》，《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魏诗》卷一，中华书局，1983 年。

⑥ 中山，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84 年。

当中原的汉族传统文化受到摧残之际，在西北，即当时被称为凉州的河西走廊地区，却依旧传承着传统文化。东汉以前，这个地区一向地广民稀。三国时期，曹操任用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教导百姓制作耒耜，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起用士人，招纳流民，兴建学校，选拔贤才，并且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经过长期的不懈经营，在河西走廊地区形成了与上述河北地区发展程度大体相当的文明，并保存了汉魏以降的文化。439年北魏帝征服河西，保存在那里的文物的精品与士人的中坚大多被俘掠到平城，于是保存在河西地区的汉魏典章和学术文化进入北魏朝廷。继承河西地区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是李冲、常景等士人。特别是李冲，由于受到文明太后的青睐，成为北魏太和年间改革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汉晋之间三次大的战乱，使中原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三，得以苟延生存下来的中州士女，十之六七迁徙到江左。与此同时，包括汉魏及西晋以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中原文化也被大量地带到那里。东晋和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就是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起来的。虽然江左的朝廷更迭频繁，而且每个朝代的统治时间都十分短促，但是除了东晋末年和梁朝末年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乱以外，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左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在江左的肥田沃土上，中州迁去的人民与当地的人民同耕共织，使那里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史家司马迁的笔下，汉代的江左是“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⑧的荒凉地区。然而，到了南朝，竟出现了“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⑨的富足局面，并且在文艺、教育与科技等方面也都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与此相应，汉魏典章制度在东晋南朝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来自中原而又有所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被以刘芳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传到了平城。

由上述可知，从长安、洛阳流散到各地的传统文化，经过一番曲折的途径，又从河北、江左、河西等地区汇拢起来，在平城撞击到一起。北魏王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曲折地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北魏平城时代

北魏王朝划分为平城时代与洛阳时代。北魏平城时代占北魏王朝整个历程的三分之二强，它是拓跋部等北方部族进入中原的准备阶段。在天兴元年进入平城的拓跋部，虽然一开始就建立了集权统治，踏上了封建化的道路，但是部落遗制和遗俗仍在不断地影响和制约其发展。消化部落遗制的影响和排除部落遗俗的制约并非短期的暴力举动或措施所能奏效，而且集权机制也需要逐步地完善，因此北魏王朝的改革与发展必然是一个

^⑧（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⑨（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良政传序》，中华书局，1983年。

艰巨、曲折的过程。这样，就使得拓跋政权在平城停留了将近一个世纪，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平城时代。对于脱离原始社会和游牧状况不久就立即面对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社会与文化的拓跋部来说，这个漫长的过程是必要的。

在平城时代，制约北魏王朝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异常错综复杂。虽然如此，在其中仍然能够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北魏皇权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由于拓跋部落遗制的不断干扰，北魏皇权的发展呈现为时起时伏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牵动着整个平城政权，使它的发展历程呈现为迂回曲折的运动轨迹。

在进入平城以前，拓跋部原本是一支包含众多部落的部落联盟。这支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拓跋部的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其首领的继承方式以兄终弟继为主导。又由于拓跋部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为时不久，故也常常受到母权制的影响，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⑩。北魏建国以后，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措施，促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解体；与此同时，他还推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将平城政权推进封建社会门槛。

不过，拓跋部落的遗俗却顽固地影响着平城政权，其中兄终弟继的继承方式和尊崇母权的风俗成了制约北魏皇权传续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道武帝末年，决心排除旧俗，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他要以汉族实行的父死子继制取代兄终弟继制。同时，为了杜绝母权的影响，道武帝还订立子贵母死制度，就是在确立储君之时将其母处死。道武帝的做法虽属改革之举，但手段过于残忍，因此酿成了一场亲骨肉间相杀戮的政变。政变的结果，道武帝死于其次子清河王拓跋绍之手，而拓跋绍又被其长兄拓跋嗣所杀。拓跋嗣最终夺得皇位，是为明元帝。道武帝末年的政治危机虽然是由皇位继承问题引发的，实际上是平城政权建立以来新制度与旧风俗之间矛盾冲突的总爆发。

像道武帝一样，明元帝也不愿意遵循兄终弟继遗制，而想将皇位传给长子拓跋焘。他吸取道武帝末年动乱的教训，采取了缓和新旧矛盾的措施，待平城政权稳定后，才将变革旧制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防止身后发生政变，明元帝采纳汉族大臣崔浩的提议，不仅建立了拓跋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太子制度，还命新确立为太子的拓跋焘监国，让拓跋焘与自己同掌国政。于是，拓跋焘继承皇位成了既定方针。从此以后，汉族惯行的父死子继制名正言顺地成为北魏皇位传续的方式。

太子焘监国仅仅一年半，明元帝就去世了。太子焘顺利地继承皇位，是为太武帝。由监国的途径当上皇帝的太武帝，照搬明元帝的措施，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监国。太子监国，作为皇权的一种辅助方式，中原王朝中虽曾有过先例，但多属权宜之计，因为它不仅不能强化皇权，恰恰相反，是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但是，太武帝却将这种权宜之计确定为常务性的制度，从而埋下了政治隐患。太子晃监国后，太武帝仍然年富力强，致使太子晃监国时间长达十二年。这十二年中，在太子晃的身边逐渐糜

^⑩ 《魏书》卷十三《桓帝皇后祁氏传》，中华书局，1984年。

集成一个东宫集团。当东宫集团耐不住长久的等待而试图超越皇权时，政治危机爆发了。结果，451年太武帝剿灭东宫集团，逼死太子晃。不久，阉宦宗爱伺机作乱，杀死太武帝，操纵了朝廷大政。

阉宦当道，皇权难以伸张，后权却在权力之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452年宗爱势力被镇压下去，太子晃的长子拓跋濬被拥上皇位，是为文成帝。文成帝即位时不足十三周岁，受制于他的乳母常氏。由于北魏后宫有子贵母死制，丧母的幼小储君需要有人抚养，因而形成了保母或乳母抚养储君的惯例。文成帝的乳母常氏因为在东宫集团被剿灭时保护过文成帝，所以文成帝即位后她的地位飞跃上升，权势急剧膨胀，并将其政治触角伸向外朝。在常氏的培植下，常氏家族和一批佞臣、阉宦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

为了长期控制文成帝，常氏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文成帝宠爱的李贵人，然后将她选中的冯氏扶上皇后宝座。常氏与文成帝相继去世后，文成帝之子献文帝即位。由常氏扶植起来的冯氏成了太后，她就是北魏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文明太后。466年文明太后一度临朝听政，但是迫于献文帝背后的宗室势力的压力，不久放弃了听政之权。不过，文明太后并未就此罢休，她仿效常氏的手段，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献文帝宠爱的李夫人，然后亲自抚养李夫人之子太子拓跋宏。继而，文明太后逼迫献文帝禅位给仅仅4周岁的拓跋宏，是为孝文帝。476年文明太后杀死献文帝，再次临朝听政。

文明太后虽然实现了长期听政的愿望，然而也因此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困惑中。因为，在父子相继已成传统的封建制环境里，文明太后无法将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续下去。文明太后曾经产生过废掉孝文帝的打算，但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取消了原先的念头。490年文明太后去世，孝文帝所代表的皇权得到复兴。

平城时代的北魏政权虽然一开始就纳入了封建集权的轨道，但是它的集权范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局限于京畿及其附近地区。平城时代的京畿包括自然地理上的大同盆地及盆地周围的山区。对于广大的中原地区，北魏政权从明元帝413年起推行宗主督护制，通过宗主去间接地统治那里的人民。直到486年文明太后采纳李冲建议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后，平城政权才达到了直接统治中原的目的。宗主督护制的推行与废止反映了平城政权对中原地区统治权力的缩盈。在道武帝、明元帝两朝，北魏王朝只不过是一个与十六国后期诸政权并列的割据政权，由于太武帝的东征西战，使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归于北魏王朝统治之下，但是，真正将统治触角伸达中原的基层则是推行三长制之后才实现的。换言之，只是在推行三长制之后，北魏王朝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政权。

三、从平城到洛阳

在纵览东汉以来中华文明的播迁形势以及拓跋政权的曲折历程之后，我们对于北魏平城时代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到它的文明顶巅便有了深入的理解。不过，也应该看

到,当来自各地的文化在平城汇合的时候,平城时代自身却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因为,大同盆地固然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平城时代,但是也限制了它向更高的境地发展。

以平城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原本是十分荒凉的,对它的开发是在北方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因战乱频仍而生产停滞长达两个世纪的情况下进行的。北魏以前,平城及其周围地区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的边郡之地。秦汉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属于雁门郡,其东部一隅属于代郡,西部一度属于定襄郡。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匈奴乘机南下,这一地区首当其冲,原居人口流散殆尽。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河东道三》云州条记载:“今州即雁门郡地,在汉雁门郡之平城县也。……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这条史料所述范围包含了平城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

魏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无力北顾,对北部边郡之地采取了放弃的态度。《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并州条记载:“魏黄初元年(220年)复置并州,自陉岭^①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由这条记载知道,至迟在三国曹魏王朝,汉族统治势力已经撤到了陉岭以南,陉岭成为当时汉族势力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一道分界线。

汉族统治势力南移以后,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先后进入大同盆地,他们对这一地区的早期开发做出了贡献,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鲜卑族拓跋部。310年拓跋部首领猗卢率领拓跋部进入大同盆地,建立代国。代国修复了汉代的旧平城县县城,以其作为南都。由于代国的经营,大同盆地的人口迅速地增长,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为时不久,代王猗卢去世,拓跋部陷入长久的内乱。后赵、前燕等国便先后乘虚进入大同盆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后赵、前燕等国相继灭亡后,前秦强盛起来。376年前秦击溃代国,大同盆地并入前秦的版图。直到383年淝水之战中前秦败北,拓跋部势力乘机重新兴起,大同盆地才又逐步安定。由于各种势力的长期角逐,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严重破坏,人口再度流散,城邑频遭毁坏。

398年七月北魏定都平城,大同盆地从荒僻的边郡之地变成了北魏王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上重点经营的地区,进入了历史上巨大的转折时期。在平城时代,从北方各地往大同盆地迁徙了大量的人口,仅道武帝时期就有一百五十余万之多^②。由于大量移民,大同盆地的民族构成日趋复杂,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部和其他游牧部族,也有从中原各地强行迁来的汉族和汉化较早的各农耕民族。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安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大同盆地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随之,大同盆地的城邑也进入了空前的建设和发展时期。

^① 陉岭,即勾注山,又名雁门山,位于今山西省代县北部。

^② 李凭:《拓跋珪与雁北的开发》,《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

天兴元年八月，即北魏定都平城后的第二个月，道武帝“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⑬，划定了京畿和郊甸的范围。京畿的范围是，“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⑭。代郡治所位于今河北省蔚县暖泉镇西，山西省广灵县东北境内。善无位于今山西省右玉县南古城村。阴馆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东南夏官村。参合位于今山西省阳高县东北^⑮。由这一范围来看，北魏京畿既与秦汉以降的陜北大体一致，又与自然地理上的大同盆地大体相当。

这种一致性，是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紧密相关的。北魏京畿位于蒙古高原与山西台地相交的断层地带。它的中部是大同盆地，盆地呈西南—东北走向。大同盆地的东部分为三支：一支溯浑河而上，直抵恒山主峰脚下；另一支沿桑乾河而下，伸向今河北省境内；还有一支展布于南洋河上游的今阳高县、天镇县境。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既适于农耕，又适于游牧。盆地四周为崇山所环绕，它的东北是熊耳山，北部和西北部为阴山余脉，西南部界管涔山脉北段，南部和东南部有恒山山脉与太行山脉。崇山之中，关隘与险峰重叠，断崖与峻岭错落，成为大同盆地与其周围地区相阻隔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又便于军事上的攻防。因此，当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区域性经济就能很快地繁荣和发展起来。这正是这一地区能够形成辖境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北魏统治时期这一地区处于的中心地位，因此能够进入长足发展的辉煌时期。

应该看到，对于大同盆地开发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在这一局部地区创造的经济价值。首先，晋末以来，我国出现了边远地区经济逐渐发展并赶上黄河流域的新局面，长江以南地区经济首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大同盆地也及时赶上了这一潮流。其次，北魏平城时代所处的5世纪是北方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并发展的时代，大同盆地凭借北魏王朝在此建国的历史契机，走到了这一时代的前列，从而在这一个世纪中成为整个北方的政治中心。第三，在开发大同盆地的共同劳动中，汉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人民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推动了民族的交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大同盆地，作为平城政权的躯壳，曾经适应和推动过北魏社会的发展；而平城政权，作为大同盆地古代史上的一个阶段，以较其他阶段更为辉煌的历程载入了史册。然而，到孝文帝统治的时期，当北魏王朝进一步向高度中央集权统治发展的时候，相对偏僻而局限的大同盆地已经难以容纳日益蓬勃发展的北魏王朝了，它终于成了束缚北魏社会的围栏。冲破这一围栏只是迟早的事情。否则，北魏就会像淝水之战后兴起的诸多游牧部落国家一样，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一时的所谓偏安政权而已。

与此同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已经处于安定局面，中原的经济迅速地复苏和发展起

^⑬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⑭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⑮ 李凭：《北魏时期雁北的城邑》，收于《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来，而中原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也进入了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孝文帝于 494 年将国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从而结束了北魏平城时代，开创了北魏洛阳时代。

孝文帝迁都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事件，它既是平城时代与洛阳时代的分水岭，又是这两个时代的摆渡船。关于迁都的原因，历史学界有种种说法，其中的两条理由是得到公认的，那就是，洛阳居于中原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孝文帝会为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的发展考虑得很远。孝文帝审时度势地作出迁都的决定，无疑是伟大的历史创举，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和中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伟大的作用。

四、北魏洛阳时代

孝文帝迁都的壮举，使融会于平城的河北、河西和江左的三股文化潮流随而涌向洛阳，为北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这一创举使洛阳不仅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景象，而且取代长安成为中国的中心。不过，在北魏洛阳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均获长足发展的只是孝文帝朝的后期和宣武帝朝。

在迁都洛阳之前，拓跋统治集团的内部已经分化。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加剧了拓跋统治集团的分化。与此同时，大批中原的汉族士族前来洛阳归顺，使得政治矛盾更加复杂。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针对旧俗的改革，其内容包括语言、服饰、籍贯、姓氏、婚姻、礼仪、官制等诸多方面，从而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文化交流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总结，则是 496 年规定族姓门第。其意义在于，提高了鲜卑贵族的门第，并使其门阀化，从而暂时调和了北魏洛阳政权所面临的诸种矛盾。同时，通过上述的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北魏王朝也完善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体制，以适应迁都洛阳以后直接面临中原地区的新形势。在此基础上，孝文帝粉碎了在旧贵族怂恿之下的太子恂等人的叛逆行动。与此同时，孝文帝还三次大举南伐，攻取萧齐的南阳五郡，控制了汉水流域，对于南方朝廷构筑了居高临下的态势。从 494 年起，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孝文帝不仅巩固了政治局势，而且奠定了北优于南的局面。从此之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北方王朝都对南方王朝处于压倒的地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孝文帝于 499 年英年早逝。

继承孝文帝的是孝文帝次子宣武帝。宣武帝的治国方针是所谓的“宽以摄下”。《魏书》的作者对于宣武帝朝有所评价，在该书的卷八《世宗纪》“史臣曰”下称：“（宣武帝）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宣武帝“宽以摄下”确实是事实，但是将他比作汉代的元、成、安、顺诸帝却并不一定妥当，宣武帝实际上也是很有作为的皇帝。

宣武帝一方面继续对南方发动战争，以巩固孝文帝朝取得的军事成就；另一方面又

在孝文帝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文治建设的措施。宣武帝提倡文治的目的在于改革社会风气,而其主要的措施则是建立系统的教育体制以推广教育。教育的发展,无疑大有益于长治久安。不过,宣武帝所面临的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宣武帝初即位时,北魏朝政控制在宗室诸王的手中。咸阳王元禧是宗室王中的首要人物,他在孝文帝临终前受命辅政,成为所谓的“六辅”之一。咸阳王元禧一向骄横跋扈,他与宣武帝之间两不相容。501年,元禧趁宣武帝行幸北邙山^{①⑥}的机会发动政变,但是没有成功。元禧被诛,宣武帝与宗室诸王的矛盾日益加深。为了扼制宗室诸王,宣武帝大胆地起用了外戚高肇。

高肇出身高丽族^{①⑦},他是宣武帝的生母高太后的兄长。高太后是孝文帝的嫔妃,但是她去世较早,直到宣武帝即位以后才追赠皇后称号。高肇在北魏朝廷原本并无权势,由于宣武帝的重用,“数日之间,富贵赫奕”^{①⑧},很快升迁至尚书令。不过,高肇倒也确实是尽力的实干家,据记载,“及(高肇)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①⑨}。在高肇的辅佐下,宣武帝抑制了宗室诸王势力,平定了政局。这种局势,自从501年咸阳王元禧被诛,高肇发迹开始;直到515年宣武帝去世,高肇被杀为止,维持了15年的时间。

宣武帝朝以后,北魏社会进入动乱状态。六镇、关陇地区先后暴动,以后进一步发展成为河北、山东大动乱。河北是北魏王朝的经济依赖地区,六镇所在的河套则是拓跋部的根据地。当这两个地区进入不安定的状态,北魏王朝便衰败了。此后的孝庄帝、东海王、节闵帝、安定王、孝武帝诸朝,先后由尔朱氏家族与高欢家族专权,北魏政权实际已经解体。所以,北魏洛阳时代的辉煌阶段,实际上指的是孝文帝朝的后期5年和宣武帝朝的高肇执政时期15年,共计20年。

北魏洛阳时代的政治平稳时期虽然只有20年的时间,但是,政治的平稳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当时的中原社会呈现了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对此,最为形象的反映当数北魏人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中的一段描述^{②①}。他写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正是北魏洛阳时代鼎盛状况的生动写照。

北魏洛阳时代占北魏王朝整个历程的三分之一弱,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

^{①⑥} 邙山,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的北郊。

^{①⑦} 李凭:《北魏两位高氏皇后族属考》,2002年6月7日在韩国釜山东义大学举行的韩国中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

^{①⑧} 《魏书》卷八三下《外戚高肇传》。

^{①⑨} 同注^{①⑧}。

^{②①}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中更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它却像划破长空的流星一样灿烂夺目，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灿烂的一页，为此后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孝文帝朝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改革，在中原掀起了众多民族参与的文化交流、融合的高潮，使北魏洛阳时代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五、从分裂走向统一

北魏孝明帝朝，胡太后两次临朝称制，试图实行改革，挽救王朝的衰败局面，但其效果与孝文帝太和改制的成就迥然相异，从此引发不断的社会动乱。风起云涌的反魏暴动，给了契胡酋长尔朱荣起事的机会。528 年，尔朱荣纠集武装，率领部落南下，发动河阴之变，沉胡太后于黄河，杀百官王公卿士数千人。这些被杀者中，集中了上层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经一个多世纪养成的北魏统治集团的中坚几乎被消灭殆尽。

尔朱氏攫取北魏朝政，残酷地镇压各地的反魏势力，实行暴虐的军事统治。这更激起各地兵民的强烈反抗，也引发了内部的分裂。掌握三州六镇^①兵民的高欢便乘机倒戈，剿灭尔朱氏的势力，随后坐镇晋阳^②，遥控北魏洛阳朝廷。

北魏孝武帝不堪忍受高欢的逼迫，于 534 年夏投靠盘踞关中的宇文泰。高欢则率部众进入洛阳，于 534 年拥立元善见，是为东魏孝静帝。随后，高欢将国都迁到邺城。孝武帝虽然西奔长安，却不甘心充当宇文泰的傀儡，又与宇文泰发生尖锐的矛盾，遂被宇文泰毒死。535 年宇文泰拥立元宝炬，是为西魏文帝。

550 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而自立，建北齐王朝。北齐地域虽较北魏时大减，但它占有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区域，那里是当时最富庶的产粮区，而且盐铁业、手工业也相当发达。然而，再好的经济条件，也承担不住北齐朝廷的横征暴敛和贵族官僚们的无厌贪求。高氏统治集团是出身于六镇之一怀朔镇的中下级军官的代表，虽然最初争取到河北世家大族的支持，但不久就与之发生冲突，而且矛盾愈演愈烈。因此北齐国力日衰，仅仅维持 28 年，于 577 年灭亡。

557 年，宇文泰嫡子宇文觉称周天王，北周取代西魏，政权则由宇文泰侄子大冢宰宇文护操纵。宇文护专权 15 年，572 年被宇文泰第四子北周武帝宇文邕谋杀。西魏、北周占有的是西北地区，大部分地方的土地瘠薄，经济落后于黄河下游。但是，西魏、北周内乱较少，宇文护专权期间局面相当稳定，其后的北周武帝致力于集权中央，巩固均田，扩大府兵，打击僧侣地主经济，遂使北周国力超过北齐。

均田是北魏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将平城时代实行的计口授田推广到中原大地而形成的

^① 三州，恒州、燕州、云州；六镇，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以上州镇分布在今河北、山西二省的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地带，是北魏抵御北方柔然的主要战线。

^② 晋阳，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

土地制度，在当时取得过显著的实效。东魏、北齐也曾推行均田制，但因受到激烈的土地兼并的冲击而遭破坏。西魏、北周的情况不同，可垦荒地较多，大土地主经济发展较缓，所以均田制推行得较成功，而且成果较易巩固。所以，北周的土地危机并不突出，政府的户调、力役也得以保证。府兵是西魏时宇文泰创建的，它是用氏族关系纽带军队的组织形式，旨在亲和将领与兵士的关系，以改善兵士的地位，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最初构成府兵的核心是六镇鲜卑中的武川军团，西魏以后其身份日益提高，北周时已被称为侍官，其成分也逐渐复杂，兵源发展到均田上的农民。这样，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成为北周国力发展的基础。

在西魏、北周王朝的上层，则逐渐组建和发展成为代表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利益的所谓关陇统治集团。关陇统治集团不仅包括元、长孙、宇文、独孤等鲜卑上层诸姓；而且也包括关陇以及河东的汉族世家大族，如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等；甚至还包括原籍山东而投身西魏、北周的世族。

基础稳固，上层协调，为北周统一北方创造了充足的条件。于是，北周武帝南通陈朝，北和突厥，发动府兵十余万，于577年攻灭北齐。完成北方统一之后的次年，北周武帝去世，宣帝继立。宣帝残暴荒淫，580年病死，其子静帝年方八岁，政权旁落在宣帝的天元大皇后杨氏之父杨坚手中。

杨坚自称弘农杨氏后裔，其父杨忠生长于武川镇。西魏组织府兵，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杨忠为大将军之一。北周时杨忠官至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随国公。杨忠去世，杨坚袭爵。宣帝时，杨坚任大司马、右司武，掌握军权。静帝时，杨坚为大丞相，进而掌握政权。随后，杨坚镇压了各方反对势力，于581年取代周室而称帝，建立隋朝。隋朝继续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因而国富兵强。587年，盘踞长江中游江陵^②一带的梁朝残余势力归隋。589年，隋军大举南下，势如破竹，攻灭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大江南北重归一统，标志北朝的终结。

北朝虽然是动荡多变的时代，但是总的潮流却是趋于统一。这期间，由于不断高涨的中原与边镇民族交流的浪潮的推动，形成了民族的大融合与文化的大融合，确定了中华特色的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走向。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经营，奠定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发轫于这个时代的均田、府兵等制度，成为后世相当长时间内遵循的典章。北朝是中国社会从东汉以降的分裂动乱走向隋唐统一兴盛时代的关键阶段，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重视的篇章。

^② 江陵，位于今湖北省江陵县。